



读书这样的事,总是常读常新。“新”的不是惊人的观点,而是扑面而来的信息,在不同的时间,会收获不同的领悟。有些文章看过很多遍,却在某一日某一刻看到了一段似乎从未读过的话。前几天又读张文江的《西游记》讲记。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或者说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形成,就像《庄子·逍遥游》的“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好的作品,是用“息”推出来的,《西游记》就是吸收了好几代人的“息”,由读者的“息”造成的。最初有一个取经的故事,过一段时间编一点上去,过一段时间再编一点上去,加一点减一点,这样积累下来,气息就渐渐丰厚了。

然后他又说了一段话,读来却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一样新鲜:“京剧像梅兰芳就是有好的听众每天在盯着你,那些人在支持你、鼓励你、欣赏你,你有一点变化,马上有人看出来,马上有人叫好,你不得不创新。梅兰芳当时有一个大的班子,吸收这些息再加以

创造才推出来……”艺术做给懂的人欣赏,好像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凝视,同样也是很大压力,好的观众,是艺术家“不得不”一直创造的动力和克服越来越复杂的困难的循环。后来,这一段话就一直压在心里。总觉得想起了什么,又说不清楚。

明眼的我们

张怡微

做学生的時候,读《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冯梦龙在故事结尾评价这一对著名的情侣,说是“明珠美玉,投于盲人”。好像李甲看不见、看不懂女中豪杰的心肠,白白辜负了一个有情女子。这个评价,似乎也适用于许多对美好事物状况视无睹、或压根没有辨识力的状况。好像《西游记》第一回,孙悟空就住在“洞天福地”,进进出出却毫不知情。又好像我们躲在没有风雨的童年里,再好的温馨都以为是理所应当的,不会失去的。一直到成熟之后,才会懂得前辈们的温和坚定,是由多少披荆斩棘、枪林弹雨的战斗换来的,而“呵护”,是点点滴滴善

意的“息”的加持。我很喜欢《西游记》第二十八回的一个段落,孙悟空第一次被唐僧赶走,内心创伤,才看懂“乘龙福老,往来必定皱眉行;跨鹤仙童,反覆果然忧虑过。”这种懂得,就好像贾宝玉看到“龄官画蔷”,才晓得全世界的女孩子不是都喜欢他一样,顿悟总是刹那出现的,谁都不能幸免。而告别懵懂以后,再想要回到懵懂的状态中去,也是不容易的。

我想起一个小说,毕飞宇的《推拿》,很有意思。小说里写到盲人按摩师都红的美貌,美到盲人推拿店的生意一点一点好起来,店长沙复明非常疑惑地观察原委。答案很快揭晓了。客人对他们盲人按摩师都很客气,说男按摩师帅气,说女按摩师漂亮,大家都不放在心上。但都红的好看实在是不太一样。不仅有一个导演肯定了她,不仅客人都喜欢点她,还有一个女的路过都红的时候“啊”了一声。可惜沙复明看不见,他从一岁开始就看不见

了。当天晚上,店里女按摩师都很嫉妒地交流着这件事,但她们同样无法描述美。小说于是写,“这是一个严肃的夜晚。沙复明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都红,却不成形。有一个问题在沙复明的心中严重起来了。很严重。什么是‘美’?沙复明的心浮动起来了,万分地焦急。”所以,这算不算“明珠美玉,投于盲人”的另一种演绎。知道有“美”的力量之后,盲人心里也是“焦急”的。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回看梅兰芳的故事,更像一个悲欢不相通的补集,是“懂得”的进步强制与想要“懂得”却不懂的热切渴望。其实,对明眼的我们也是一样的,“美”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抵达的世界,相信它、呵护它、雕琢它、它就可能存在于远方。不相信它,听说过它,也可以过没有它的日子,消沉的日子。爱也是如此。听说世界是明珠美玉,怎么个明珠美玉法,谁知道呢,看都看不见,如何驯服它呢,这真让黑暗里的人焦急。驯服它的人,看似站在了光明里,却不得不坠入创造的循环中去了。

1965年9月初,当时市委主管文教卫生的书记要组建一支乌兰牧骑式的“上海市文化工作队”,由市文化局、出版局抽人组成。这个队以海派人民沪剧团(上海沪剧院前身)为主,副团长担任队长,会吹拉弹唱的男女老少总共18人,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我也在其中。

那年下乡

朱伟

两三天后,我们到了奉贤县三官公社光明大队,住宿在大队办公室旁边、贫下中农让出来的灶间。高低木床放了六七个,中间用课桌拼起来是开会和写东西用的。20多平方米的灶间只剩门口烧柴的大灶,还有一个很大的盛井水的缸。几个女的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当时的上海郊区农村还非常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我们吃饭搭伙在大队砖窑厂,每天不是青菜,就是当地人说的“捏落苏”(生茄子用盐捏一下吃)。吃的糙米饭会一粒粒往下滚的。大队办公室门前有条公路,通往公社,也通县城。但是,这条路晴天一阵灰,雨天一地泥。条件艰苦,卫生更差。苍蝇蚊子齐飞舞,不得安宁。

有天晚饭后,队部安排三人一组分头去生产队开会。尽管当年农村艰苦落后,白天还是蓝天白云,夜晚看到满天星星。我们三人走在田间小路上还不用点煤油灯,可以看到远处草屋炊烟袅袅,还能隐约听到勤劳农人的织布声。青年演员小X情不自禁唱起了“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她一曲没唱完,我两腿发软,慢慢地蹲了下来。他们扶着我走到生产队,农民兄弟叫我躺到床上,盖了厚厚的乡下老布棉被。过了一会儿,出了一身汗,好了。

后来几天又发了,人一下子瘦了好多。公社书记很关心我们,他知道有人生病后马上打电话给正在公社巡回医疗的上海市卫生工作队。医生叫我马上去县医院验血。他看了报告后说:“这是很凶险的疟疾,隔日发作的。”他给了我两包药,一包是马上服用的,另一包嘱我开春再服,可以断根不会复发。我按他说的,果然没有复发过。

时隔38年后的“非典”期间,我从电视、报纸上看到,当年为我看病的年轻医生,就是后来有名的传染病专家巫善明教授。我们在农村足足待了8个月。这8个月,让我这个城市长大的人体会到当年农村的艰苦和落后。几十年过去了,当我重回故地,却已经找不到一点昔日的影子。我到欧洲旅游时,也曾多次遇到从奉贤农村来的朋友。他们的生活,早已天翻地覆!

数码时代来临,为了方便,我早已舍弃了胶卷相机。现在一张薄薄的记忆卡,可以储存数千张照片,满了,再转至硬盘保存,再也不冲洗成纸质照片,久而久之,照片便淹没在强大的记忆硬盘里。

勾良苗寨

叶国威

闲来整理一批旅行照片,许多背着大背包的身影浮现眼前。那时年轻,一个人说走就走,选定先到一个目的地,要再去哪儿?再说。看着凤凰古城、勾良苗寨的照片,想起当年是何而来——不就是想看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那年大年初三,清晨6时从长沙开出的火车,终于到达吉首,在火车站前有车开往凤凰古城,约40分钟车程。在同车的人群中有一对夫妻来自广东佛山,因为同是广东人,我们一下子就

看到苗人在水边洗菜、洗衣,似乎生活上所用的水都靠这一湾清泉。在村寨广场先占了中间的位置,却发现我们的小导游桥先不见了。表演节目准时开始,出来一群小姑娘及小伙子,哦!我们的小导游原来是演员之一,他们又唱又跳,尽现了苗族的纯朴与乐天知命。表演中有一项是苗族婚礼,我被一位苗族小姑娘选了出去,主持人叫我们把手中的花送给对面愿意的人,我把花给了站在我对面的小女

孩,这女孩看来有点可爱,又有点野蛮。苗族的婚礼是这样的,男的先要蒙上双眼,然后转圈,并要按别人的提示寻找新娘,同时要用炭灰在新郎的左右脸颊上抹一下,据说说可以去邪纳吉。找到新娘后,解开眼罩,喝交杯酒,并且要两手合握放于身后,新娘会单膝跪在合掌中,新郎要背着新娘走向新房。表演清完后,小导游桥先帮我请那两位小姑娘和我合照留念,先前送花给我的小姑娘叫吴诗宁,是一开朗的女孩,而我的新娘叫吴凡,名字很

简单,看她机灵,应有不凡人生。

看完表演,大家肚子也饿了,我问桥先哪一家农家饭好吃,他说不清楚,我们只好沿路往上走,经过勾良村59-60号,见主人相当纯朴热情,大伙决定在这里吃午饭。他们在大灶上挂了许多熏肉,这些应该都是苗人的特色。主人请我们点好菜后,他便生火煮饭和准备炒菜。我请司机、桥先和我们一起用餐,桥先确是一单纯又害羞的小孩,他坐在我身旁只顾把白饭往嘴里送,都不敢夹菜,我只好照顾他,夹菜夹肉给他。也很久很久没有吃过用柴火烧成的米饭,还有锅巴,吃一口,真的有说不出的幸福。吃饭时,和桥先聊了一聊,原来他念初三,因放假寒,就在寨中义务帮忙,学习待人接物。

用餐后,我们就在寨中游逛,曾上过一次吊脚楼,有老奶奶教我们体验如何使用织布机和拉线机,挺有趣的。当要离开苗寨时,我给了桥先一个红包,起初他不肯收,我还是硬塞给了他,想他会因为被肯定而更上进。在寨门口,看到我的新娘抱着一位小男生,我帮他照相,他却害羞地用小手把脸遮住,天真得和他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一样。

劳动号子

王选来



我最早听到“劳动号子”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居住的老巷围墙的后面,正在建造一所中学。当时,普通的建造房屋,都是砖木结构,单砖砌墙,地基是靠人工拎起大石块来夯实的。夯地基一般有四位或八位建筑工人,其中一人领号:“拎起来哟”,众人齐喊:“夯哟”“哟哟哟喂,齐心协力么嗨哟”……当时,我仅5岁,但听到这号子声,觉得非常好听且振奋人心!因此,经常和几位儿时的伙伴,去围观去倾听,直至建筑工人们休息,我们才回家去。

后来,又看到码头工人扛大件货物,4人、8人乃至12人,喊着号子,抬上船或抬下船。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知晓了这种很好听的吆喝声,叫“劳动号子”。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韩非、赵子岳、凌元等主演的故事片《锦上添花》,用喜剧的形式来演绎“劳动号子”,让人忍俊不禁,但同时说明了“劳动号子”在群体劳动生产中的协调和指挥作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上海农民创作的一首大合唱《社员挑河泥》,则是用“本地人”的方言,把“劳动号子”用大合唱的形式表现得极其完美、动人:“嗨嗦嗨嗦嗨嗦嗨,嗨嗦嗨嗦嗨嗦嗨,拾辣辣子嗨嗨拾辣辣子嗨,嗨嗨拾辣辣子嗨,嗨嗨拾辣辣子嗨……”,这首以“劳动号子”为基础的大合唱,来自基层,乡土气息浓郁,音乐旋律铿锵不失优美,曾作为上海民族乐团合唱队的保留节目,并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广为传唱。至此,我才真正理解了“劳动号子”在群众性劳动生产中所具有的鼓动、协调、指挥的功能和作用!

躲过她的法眼。听母亲的,上师范。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已从教育系统调入文化系统,在区文化馆当馆长。我典型的人物,拍摄六十部纪录片,以此展示新中国六十年的巨变。全国有九十多万个建国和四十多万个国庆,大海捞针,我,竟然被捞到了。纪录片播出那天,我早早地带着全家人正襟危坐在电视机前,片子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分钟,我却乐得眉飞色舞。朋友们“贺喜”的短信,更是挠得我热血沸腾,欣喜若狂。

母亲为我取的名

瞿建国

我出生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母亲饿着肚子为我取名,叫“建国”。母亲说:“建设新中国,阿侬也不能落后。”从此,这个名字就一直伴随着我。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被一个高年级的大“建国”打了,因为他问我怎么可以也叫建国。回家我说要不我就改名不叫建国了吧。“不能改!以后他要是再欺负你,你就上,输了,你就告诉娘,我把生产队里五十个妇女全叫上……”这就是我的娘,当妇女队长的娘,从不认怂。因为我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她带头挑秧,妇女队长的儿子也必须带头挑秧。三年里我就参加了六条河道的开挖。

高考了!我考上了上海第六师范。我觉得考得不好很没面子,不想去读这个中学。于是冬季征兵时,我报了名。恰巧第六生产队那位与我同名同姓的瞿建国和我一起去应征,弄得体检医生晕头转向。医生盯着我们叫:“到底哪个是瞿建国?出来!”当两个瞿建国站在他们面前时,都傻了。六队的瞿建国一受惊吓,心动过速,被刷了下来。我则顺利通过体检。想到马上就要身穿戎装,我兴奋不已。没想到,人生真的充满了意外——我被别人调了包!欢送新兵的锣鼓响起的那天,母亲对我说:“上师范也蛮好的,你想当兵不过是羡慕那套行头吧?”我暗想,母亲厉害啊,洞若观火,啥都没能

泪。后来还得了一个上海市舞台作品大型作品奖。这些年,母亲与我同步,也噌噌地变化着,先是患了高血压,之后又患了糖尿病,现在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八十多岁了,都当上曾祖母了,还以为自己刚结婚。有一天,我开车带着她出去兜风,她坐在车里,不停地侧身看我,终于憋不住问:“驾驶员,你姓啥?”我的娘!她不认得我!这个紧跟形势、目光远大、坚强不屈、从不认怂的母亲,她的小脑,格式化了!“阿娘,我不是驾驶员,我是你的儿子。”“那……”她想了想:“你叫……建国?”她还能记住我的名字——建国。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这大清早我们是最早到达的一批人,在寨门口买了门票,车行尚要10分钟才能到村子口,当到了村口有一小伙子上车,自称桥先,是我们的导游。他年纪很小,有点羞涩,并不多话。车又继续走了十多分钟的山路,到了古妖潭瀑布群的入口,一行人沿山路向下走没多久,渐闻水声潺潺,到了谷底一看,碧水飞虹,一扫清晨倦意,令人心旷神怡,若在雨季,定更为壮阔。由于我们来得最早,一池碧水平静息,当我们涉足,划一竹筏,碧潭才从沉睡中睁开了眼。一个多小时后,回程往村寨,在进入村寨前,我们也得按苗例,唱了歌、喝了酒才可放行。因在11时半村寨广场中有苗族的歌舞表演,所以我们疾步前去。此村寨有绿水环抱,

养育 1977年,恢复



高邮路(剪纸)

李守白作

七夕会